

导 论

在川、滇、藏交界的澜沧江峡谷主要生活着藏族、纳西族，在其东边的金沙江流域和西边的怒江流域，则除了藏族和纳西族，还有其他民族^①。每一个民族都是由一些次级群体构成的。长期以来，这里的每个民族共同体及其次级群体都是自给自足的，由于剩余产品的出现和互通有无的需要，交换就发生在他们居住的边界。盐是一种特殊的交换媒介，长年累月地影响着各个群体的生活特性与生产方式，形成该地区居民的共同传承。可以说，盐推动了当地民族的产生，创造了当地的历史。

第一节 盐与早期部落社会

就人类社会而言，没有哪一种物质比盐更为重要、更具意义。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谈到：“辛酸甘苦经年绝一无恙，独食盐禁戒旬日，则缚鸡胜匹，倦怠恹然。岂非天一生水，而此味为生人生气之源哉。”^②著名藏学家任乃强也曾说道：“人类各种动物，以至于原生动物，凡具新陈代谢之生理功能者，无不需一定的盐分供给。愈高级至于人，需要之量愈多；苟完全脱离食盐（氯化钠），即不能活；不唯食欲为之衰退，排泄发生困难，即血液循环亦将发生奇变。牛、羊、马、鹿等草食兽，每牧至盐泉浸渍处，恒舐土不肯去。家畜消化不良时，微饲以盐，即能康复。……此生理之自然，非可以嗜好拟之也。”^③可见，盐是人和动物不可或缺的物质，常被称之为“生命的食粮”^④。不仅如此，盐在早期部族的定居、部落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起源的整

① 金沙江东岸分布有彝族，怒江流域分布有怒族、独龙族、傈僳族等民族。

② 宋应星编著：《天工开物·作咸》，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05页。

③ 任乃强：《说盐》，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④ [法]皮埃尔·拉斯洛著：《盐：生命的食粮》，吴自选、胡方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个过程中，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青藏高原而言，任乃强先生认为西藏东部的古老民族能停留在今天的昌都一带，与当地分布有丰富的盐泉不无关系。^①那么，早期的部落社会中，盐究竟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学者任桂园对三峡地区古老部落“巫国”进行论述时提到：

“咸”字最为原始的意义，乃是表“人人皆需的食盐之味”，所谓“皆也、悉也”的意思，当由引申而来。而所谓“巫咸”，即是生活在宝山盐泉涌流之地的一个部落首领的名称，同时这位首领的名称，也成为该部落以及该部落所在地域的总的名称……关键在于他（首领）和他的部落掌握了涌流不绝的宝山盐泉。有了足够的经济资本，自当称雄一方，成为该地域范围内众多部落联盟的首领。^②

以上任桂园的论述表明：盐和一个部落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联系，部落联盟的首领掌控盐资源后可为其加强权力控制增加砝码。按《尚书·禹贡》所载“海岱惟青州……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③可知，盐在当时已是重要的贡品，较为稀缺，拥有盐是权力的一种象征；从盐的进贡和接纳这一过程来看，已出现社会等级现象。显然，部落首领通过掌握制盐技术，拥有经济资本，以此树立权威，获得统治权力。

据学者研究，商周及之前曾在渝东、鄂西一带活跃的巫、巴、蜀等部落民族，对早期川西一带盐的发现、制作和运输颇有贡献。^④任乃强指出：“人类文化，总是首先从产盐地方发展起来，并随着食盐的生产和运销，扩展其文化领域。文化领域扩展的速度，殆与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是否有利于食盐运销的程度成正比例。起码，在17世纪以前，整个世界历史，都不能摆脱这三条基本规律。”^⑤盐一度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资源，以盐为核心的区域文化的形成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何国强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政治活动的目的就是获取资源。”^⑥的确，在有关早期国家形成的学说中，冲突论占据了一席之地，

① 参见任乃强著《羌族源流探源》，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② 任桂园著：《从远古走向现代——长江三峡地区盐业发展史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74～75页。

③ 王世舜：《尚书译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④ 参见任乃强著《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⑤ 常璩撰：《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⑥ 何国强著：《政治人类学通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8页。

其观点是精英者对资源的占有,导致权力的集中,从而推动国家的形成。学者指出,美洲大陆上几乎各个文明中心的建立均与盐业生产有关,玛雅文明的孕育正是建立在盐的生产和贸易上。^①显然,该观点对于揭开区域文明的历史是有帮助的。刘星灿、刘莉等在其《解盐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一文中,通过对山西河东盐池相关历史文献的解读,结合考古学分析,认为“至迟公元两千纪中期,河东盐池的盐业生产和分配已经有国家介入了,这一政策也许是国家起源同时诞生的。换句话说,食盐官营是中国早期实行的政治策略之一,它有助于早期国家的集权和扩张”^②。

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传入中国后,将中国的复杂社会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形成的话题作为考古学研究重点的对象。不少西方学者对新石器时期晚期及青铜时代的黄河谷地的集权制邦国和国家扩张的形成过程产生了兴趣。^③这一过程传统上被认为是中华文明和相邻区域文明的核心。^④付罗文(Rowan K. Flad)在《中国古代盐业生产和社会分层:三峡专业化考古调查》(*Salt Production and Social Hierarchy in Ancient China: A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Specialization in China's Three Gorges*)中提出:为检验在中国涌现的社会复杂性,必须探究的关键因素是社会成员相互依赖以及他们卷入权力分层关系的程度。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上的专门化分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该文中,他挑战了传统观点。传统观点认为,当专门化生产被新晋的社会中层精英当作获得财富积累的一种策略时,这将涉及具有象征性商品的生产。付罗文则认为,事实上产品应当放在具体的消费情景中理解(比如,盐就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产品——笔者所加),许多对社会分层起重要作用的专门化生产的商品都显现出本体论上的多样性,盐就是这样的一种产品。盐业专门化生产的增长和青铜时期华中地区不断发展的社会复杂程度联系密切。付罗文还对科斯廷(Costin)提出的模型进行了改造,提出分析社会专门化生产的不同层面的模型。该模型主要描述生产过程的交叉因素,包括了强度、集中程度、规模、工人间的关系以及生产语境,其目的是为了厘清生产体系中的不同方面,以便掌握生产的

① 参见[美]戴尔·布朗主编《辉煌、瑰丽的玛雅》,张燕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② 陈星灿、刘莉、赵春燕:《解盐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见李水城、罗泰主编《中国盐业考古(第2集)——国际视野下的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4页。

③ Chang, Kwang-chih.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Creel Herlee. *The Origins of Satecraft in China: The Western Chou Empi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Li Liu. *The Chinese Neolithic: Trajectories to Early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④ Nelson Sarah M. "Ide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State in Northeast China". In: Classen H J and Oosten J G eds. *Ide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State*. Hague: Brill, 1996. pp. 153 ~ 169.

社会因素。^①

通过对中坝遗址的考古学分析，付罗文认为在早期的青铜时代，并没有明显的社会阶级现象出现，但是，相关的仪式性占卜活动已经被少部分人控制，被这一新晋的精英阶层当作管理盐业生产和分配的策略，而他们的权威所依赖的是对仪式知识和占卜的控制。^② 这和古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在巴鲁亚部落社会研究的情况如出一辙，巴鲁亚部落的盐并不是从海水或盐矿中获取，而是从一种植物中提取。制盐的过程是复杂的，因此，这项技术仅被少部分掌握巫术和技术出色的专家所掌控。^③ 对资源的掌控将引起社会分层的刺激，以致政治权力层随之发生调整。因为，围绕盐业技术的掌握，盐的运销和分配均涉及权力的博弈关系。

早期部落之间围绕盐泉或盐池的争夺比比皆是。在唐代，中央王朝和吐蕃、南诏在定笮（盐源）一度为了盐池争战多年。唐开元、天宝年间，爨氏集团、南诏、唐王朝三方势力在安宁（今昆明安宁市）盐井的争夺最为激烈。^④ 大理国时期，段氏分封他的贵族世守各地，其中的孙氏、袁氏、高氏在安宁城不断争夺盐池，导致地方社会的权力秩序不断更迭。^⑤ 在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保卫盐田》，正是描述两个部落争夺盐泉的传说，背景是岭国（部落）的盐田被姜国发现后，发动了侵占盐池的战争。

第二节 相关文献回顾

一、盐业相关问题研究概况

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盐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因此，各国盐业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人类制盐起源于何时，至今学术界并无定论。

① Rowan K. Flad. *Salt Production and Social Hierarchy in Ancient China: A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Specialization in China's Three Gor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 ~ 2.

② Rowan K. Flad. *Salt Production and Social Hierarchy in Ancient China: A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Specialization in China's Three Gor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

③ Maurice Godlier. *Perspectives in Marxist Anthropology*. Translated by Robert Br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32 ~ 140.

④ 参见李何春《唐代吐蕃和南诏的制盐技术比较分析——兼论吐蕃东扩之原因》，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⑤ 参见赵敏著《隐存的白金时代——洱海区域盐井文化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0 ~ 51页。

明代旧志载：“考盐名，始于禹，然以为贡，非以为利也，至周始与民共利之。”^① 有学者认为丘濬的观点来源于《禹贡》，尽管《禹贡》被认为是地方志方面的经典之作，但是其所描述的内容和时空的确定上，还需进一步考证。夏时并无文字，是否已经有盐出现，则不得而知。殷商有甲骨文，但未确定有“盐”字出现。^② 又据汉代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出现“盐”字时说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从卤，监声”。看来这个时候的“卤”和“盐”已经被区分开来，天然形成的盐水称之为“卤”，经过人类加工后称之为“盐”。不过人类开始利用天然的卤水的历史，应该可以推至新石器时代。

有关中国古代国家对盐业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控制，一般认为始于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他是早期政府控制食盐专卖制度的创始人。^③ 长期以来，中原文明都有编史的传统，因此可知中国盐业文化源远流长。学者认为，中国的制造业当中，盐业相关的文献记录相当可观，除了农业和纺织业可与之相比外，其他行业均无法与之比较。^④ 因此，有关盐业的研究情况无法一一进行论述。^⑤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盐业的相关问题研究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是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化工制盐技术研究；二是人文社会科学对盐业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从化工制盐技术的相关研究情况来看，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1) 化工制盐技术在工业原料生产上的应用。盐是化工技术中的重要原料，可进一步制成钠、碳酸钠、碳酸氢钠、小苏打、苛性钠、氢氧化钠和盐酸，而这些产品可广泛应用到国民经济中的各个部门，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如何提高工业用盐的技术成为自然科学领域关注的问题。此外，随着人口增长、盐的消费总量不断增加，化工技术还关注如何提高不同种类生活用盐的技术水平。前者在研究方面主要通过化学工艺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如《盐业化学工艺学》^⑥一书分两个部分讨论化学制盐工艺，第一部分讨论了海盐、湖盐、岩盐的制盐过程以及天然卤水通过几道加工程序制成

① 丘濬编：《盐法考略》，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② 参见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峡江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互动与诸要素的适应性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页。

③ 参见陈星灿、刘莉、赵春燕《解盐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载李水城、罗泰主编《中国盐业考古（第2集）——国际视野下的比较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

④ 参见〔德〕傅汉斯《从煎晒到暴晒——再谈帝国时代的中国海盐生产技术》，林圭侦译，见李水城、罗泰主编《中国盐业考古（第2集）——国际视野下的比较观察》，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⑤ 对盐业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见吴海波和曾凡英著《中国盐业史学术研究一百年》，巴蜀书社2010年版。该著作系统介绍了自1909年以来近100年来中国盐业史研究的相关主题和内容。

⑥ 北京轻工业学院主编：《盐业化学工艺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2年版。

盐；第二部分运用了化学的元素含量分析和提取法来讨论各种卤水资源如何有效地综合利用，这方面的成果较多，包括《海水制盐工艺学》《制盐与苦卤工业》《加锰晒盐法》《制盐技术》《海盐工艺设计》等著作，均基于化工理论来探讨基于精密仪器的机械化操纵下如何提高工业用盐的效率。类似的文献还有很多，基于本书的研究方向是传统制盐技术，相关性不大，因此不再冗述。

(2) 依赖仪器、设备进行地质层的成盐过程、盐的纯度、各种成分的比例的技术性测定分析。这包括化学实验分析研究和地层地质分析。化学实验分析是通过将卤水取样进行实验分析，得出卤水中诸如水分、不溶物、铁铝氯化物、硫酸钙、硫酸镁、硫酸钠、氯化钠等成分的比例。例如，崔克信在《盐井县之地质及盐产调查》^①一文中正是利用化学试剂测定盐井卤水中上述各种成分的比例。而对于地质学研究而言，主要通过盐泉中同位素特征示踪研究来得出地层中卤水成盐过程。目前将此法应用在分析西藏盐井盐成盐过程的文章有《西藏盐井地区盐泉同位素特征示踪研究》^②一文。

总体看来，化工技术对本书的研究有以下启发和意义：一是化学元素分析法对卤水和成盐的分析，利于人们在研究盐业过程中，准确把握盐的纯度，而盐的纯度直接同产量和效率相关，盐的纯度又将影响到人们对盐的接受程度。成盐过程的分析，指导人们通过地势、岩层来掌握盐的整个补给系统，以此掌握传统盐业产盐所必需的地理环境。二是现代技术水平和制盐工序是原有的传统技术的升华和发展，因此二者具有继承性和相似性。此外，食盐产量和人口总量有直接关系，直接体现在市场和生产者之间的供求关系上。

人文社会科学对盐业的研究以历史学为主，政治经济学次之，考古学有部分涉及，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最弱。总结中国 100 年来有关盐业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八个方面：私盐问题研究、盐商问题研究、盐业制度改革问题研究、盐业人物研究、食盐专卖问题研究、盐的利润问题研究、盐的消费情况问题研究和盐与地方社会的问题研究。在这八大研究主题中，盐业制度改革问题研究、私盐问题研究、食盐专卖问题研究和食盐与地方社会的问题研究等领域，无疑是盐业研究的重头戏。一般而言，历史学研究有关盐业的盐政、盐法、专卖、私盐、盐业改革、盐业人物、盐产地、盐商等较宏观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则主要研究盐法、盐政、盐的专卖、盐税改革、盐的利润、盐的消费、盐与地方社会、盐与资本主义的萌芽等中观问题。文学艺术学主要进行与盐相关的事件、人物、制盐的工具、构造、制盐户的建筑风格、雕像等美学研究，包括了

① 崔克信：《盐井县之地质及盐产调查》，载《西康经济季刊》1944 年第 8 期。

② 漆继红、许模、张强、覃礼貌：《西藏盐井地区盐泉同位素特征示踪研究》，载《地球与环境》2008 年第 3 期。

旅游者的记录、回忆、游记等。

相比较而言,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主要通过微观视角分析盐与当地社会的生活、习俗、精神、族群互动、贸易往来等问题。考古学则通过考古发掘的手段,对器物的分析、归类、推演,来重构历史,为其他学科研究这一方面的内容提供资料,特别在缺乏文献记载的区域,如有考古发掘提供证据,会大大加强论证的力度和提高论证的可信度。由于历史学研究盐业相关问题的著作多,涉及的范围广,吴海波和曾凡英在《中国盐业史学术研究一百年》中对中外研究中国盐业自1909年到2008年的论文和著作进行了分门别类的介绍,因此有关具体研究情况,无须冗述。不过,还需指出各门研究盐的学科也存在交叉关系,未必严格遵守学科界限。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可分为井盐、海盐、岩盐,如果再做细分,可分为井盐、海盐、池盐、湖盐和岩盐。井盐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包括现在的重庆),海盐主要分布在中国沿海一带,池盐和湖盐分布在藏北、青海、新疆、内蒙古等西北部地区,岩盐却分布比较少。傅汉斯综合学者的观点后认为,在帝国时期的中国传统盐业,山西的解州盐湖是中国食盐10%~15%的来源地,四川和云南的井盐则占5%左右,80%~85%的食盐则是来源于海盐。^①从技术研究来看,主要围绕井盐技术、海盐的晒盐技术来展开,井盐制盐技术中当属川盐的钻井技术较为重要,池盐国内较少利用,研究相对薄弱。

从研究的历史时期来看,主要集中在汉代、唐代、宋代、明代和清代,这是因为这几个朝代推行盐业改革制度的成效较为显著。从研究的专题来看,主要集中于私盐问题研究、食盐专卖研究、食盐场地研究、盐业人物研究和官商关系研究等问题。此外,还有一些特殊方面的研究。比如,姜涛认为中国人均每年的用盐量在10斤^②;姜道章在《中国清朝盐的消费》^③一文中,就我国不同地区的每年人均的食盐消费量进行了比较分析。据其估计,在“清时,中国人均每年所需的食盐量为13斤。华南、华中因气候湿润,出汗较多,对盐的需求极高,其平均数为14斤;西南地区则为13斤;华北地区因气候干燥且北方人食肉较多,需盐量较少,平均每人每年为12斤”^④。姜氏的这一估算结果并不一定准确,但我们依然可以认为,它为后人研究不同地区的食盐消费问

① 参见[德]傅汉斯《从煎晒到暴晒——再谈帝国时代的中国海盐生产技术》,林圭侦译,见李水城、罗泰主编《中国盐业考古(第2集)——国际视野下的比较观察》,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② 参见姜涛《食盐与人口》,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1斤=500克。

③ Ching Tao-chang. "Salt Consumption in Ch'ing China", *Nangyang university Journal*, 1974~1975, v. 8&9.

④ 引自吴海波、曾凡英著《中国盐业史学术研究一百年》,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196页。

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点。例如，李中清利用人均每年消耗的食盐量来估算清代云南的人口。^①

二、国内制盐技术史研究

研究中国制盐技术史是国内盐文化研究的重要部分。其中，海盐生产占较大比例，湖盐生产次之，井盐生产又次之。此与技术难度的递增有关，技术越难，越考验劳动者的智慧，对研究者来说难度也会增加。下面的论述围绕海盐、井盐的制盐技术史展开。

海盐是最古老的盐种，《说文》里记载“古宿沙初作煮海为盐”，这种说法仅限于传说，并无根据。但是，到商代已经确定，盐已经作为一种必需的调料品出现。白广美在《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一文中认为海盐的制盐法主要有直接煎盐法、淋卤煎盐法两种，晒盐法是元代发展起来的。此文同时指出，学者往往忽视了直接煎盐法，其依据是《煮海制盐图》所提供的场景，即盐丁用长柄勺将海水倒入木桶中，另外两人负责将海水运至锅灶上方的水池，灶口则有人负责添加柴火，旁边有人不断将锅中的结晶的食盐铲至缸内，另有数人将盐送往盐仓储存，该法一直使用到宋代。^②但是傅汉斯则提出《煮海制盐图》所表现出来的内容不一定真实。他认为“这些混乱不清的描绘也有可能是由于绘画者不了解海盐真正的生产情形所致”^③。二者的观点均有一定道理，问题的结点在于煮盐之前是否已经有一道浓缩卤水的工序。傅汉斯对此引用了《南史·张融传》的《海赋》^④一诗的内容，以此说明5世纪的时候海盐的制作是经海沙过滤后制成浓度高的卤水，然后再进行煎卤，以此获得食盐。此外，朱金林在《对〈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的几点浅见》一文中同意白广美的观点，只是认为从直接煎盐发展到淋卤煎盐法，时间划界上可将此法推至唐代。^⑤

对淋卤煎盐法的概说，学者基本上认同存在两种相似的方法，即“刮灰淋卤”和“晒灰淋卤”。傅汉斯强调“或用灰，或用沙、土淋滤制作浓卤水，

① 参见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见《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71页。

② 参见白广美《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载《盐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③ [德]傅汉斯：《从煎晒到暴晒——再谈帝国时代的中国海盐生产技术》，林圭侦译，载李水城、罗泰主编《中国盐业考古（第2集）——国际视野下的比较观察》，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④ 其四句诗是“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署路”。见[唐]李延寿撰：《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33页。

⑤ 参见朱金林《对〈中国古代海盐生产考〉的几点浅见》，载《盐业史研究》1991年第2期。

目的都是为了在熬盐的过程中节省燃料”^①，由此看来，早期的煎煮海水较关心燃料的来源和成本，于是傅汉斯对传统的海盐分段制盐法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在煎煮海水之后，出现了浇淋与暴晒结合的阶段。该阶段可以对传统制造卤水的方法加以保留，只在最后阶段才将卤水放入池中或便于携带的木盘中暴晒。经过该阶段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在水池中分段蒸晒卤水的技术，分段池中的海水起到了浓缩卤水的作用，而基本上放弃了木柴的使用。这种方法，史料中的记载是出现于16世纪福建、长芦等盐场，但或许在更早的时代就已经被使用了。^②

有关晒盐法的起源，各有说法，大体有宋元以前说、宋元说、明代说三种。白广美依据元代官修《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所载“（福建运司）所辖十场，除煎四场外，晒盐六场。所办课程全凭日色晒曝成盐，色与净砂无异，名曰砂盐”，又《元史·食货志》“福建之盐，……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实办课三十八万七千七百八十三錠。其工本钞，煎盐每引递增至二十贯，晒盐每引至一十七贯四钱。所隶之场有七”，认为中国的晒盐法起源于元时期的福建盐场。^③林树涵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肯定在南宋前期，在福建海盐一带已经使用晒盐法的观点。^④傅汉斯则认为，日晒法在明代才被福建盐产区广泛使用，并逐渐扩大到两淮、两浙、广东、长芦、山东等地。^⑤综上所述，晒盐法并非是最传统的制盐方法，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之后才形成的，这种制盐技术明代时已经在全国推广开来。

井盐，普遍使用煎煮法。吐蕃统一青藏高原以前，高原东南部的民族使用炭取法制盐，有书为证：“白摩沙夷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⑥；“越嶲先烧炭，以盐井水泼炭，刮取盐”^⑦；“昆明城有大盐池，比陷吐

① [德] 傅汉斯：《从煎晒到暴晒——再谈帝国时代的中國海鹽生產技術》，林圭偵譯，見李水城、羅泰主編《中國鹽業考古（第2集）——國際視野下的比較觀察》，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4頁。

② 參見[德] 傅漢斯《從煎曬到暴晒——再談帝國時代的中國海鹽生產技術》，林圭偵譯，見李水城、羅泰主編《中國鹽業考古（第2集）——國際視野下的比較觀察》，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頁。

③ 參見白廣美《中國古代海鹽生產考》，載《鹽業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④ 參見林樹涵《中國海鹽生產史上三次重大技術革新》，載《中國科技史料》1992年第13期。

⑤ 參見[德] 傅漢斯《從煎曬到暴晒——再談帝國時代的中國海鹽生產技術》，林圭偵譯，見李水城、羅泰主編《中國鹽業考古（第2集）——國際視野下的比較觀察》，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頁。

⑥ 常璩：《華陽國志·定笮》，齊魯書社2010年版，第42頁。

⑦ 李膺：《益州記》，此文轉引自（北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卷八六五》，中華書局1960年版。

蕃。蕃中不解煮法，以咸池水沃柴上，以火焚柴成炭，即于炭上掠取盐也”^①。以上三处地名中“白摩沙”和“昆明”指同一地方，即今四川省盐源县和云南省宁蒗县相交的地带；“越嵩”指今四川省西昌市，与盐源县较近，应为同一范围，该地过去为炯族世居，生产习俗为将木柴放在盐水中浸泡，然后将木柴烧成炭，刮取炭表面的结晶盐。这表明当地人当时还未知内地的煎煮法，由此推及当时的盐井在技术上应同例。

井盐制盐技术当以川盐最为发达，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井盐的钻井技术，这是11世纪中叶前后中国盐业技术史上的一大发明。19世纪初期，川盐的钻井深度可达800~1000米，而此时欧洲的钻井技术还很难突破200米的深度。^②二是将天然气运用到煮盐过程当中，这项技术可以追溯至3世纪，到魏晋之后中断，到了明代开始恢复使用。这项技术对推动盐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③

西藏盐井盐在制盐技术上采用的是风吹日晒法，而卤水的获取则是采用传统的钻井法。这种现象不仅在国内少见，在国外也鲜有例子。应该说，盐井盐是海盐和井盐传统文化的一种结合。

三、西藏盐井盐业研究概述

（一）史料和方志的记载

最早系统描述盐井概况的地方文献，当属段鹏瑞于宣统元年（1909年）所著的《巴塘盐井乡土地理志》，又称《巴塘盐井乡土志》或《盐井乡土志》^④，该书被称为是西藏唯一的一部乡土志。该志目录中设有“盐田”一节，对盐田的基本情况、分类、产区和晒法均做了论述，但均未涉及税收和运销。此后，金飞在对盐井做了一定调查的基础上著有《盐井县考》^⑤一文，于1931年发表在《边政》上，但调查过程及写作时间不详。该文内容主要包括盐井的山川形势、来源及质点、制法及操作、民情及销路四个部分，文后附有

① 樊绰：《蛮书》，向达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96页。

② 参见〔德〕傅汉斯《从煎晒到暴晒——再谈帝国时代的中国海盐生产技术》，林圭侦译，见李水城、罗泰主编《中国盐业考古（第2集）——国际视野下的比较观察》，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

③ 参见张学君、冉光荣著《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70页。

④ 段鹏瑞：《巴塘盐井乡土志》，国家图书馆宣统二年（1910年）铅印本，按段鹏瑞在自序中所言，完成于宣统元年十二月。该乡土志在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时，吴丰培建议去掉“巴塘”二字，理由是“今巴塘属川，盐井属藏，不相隶属，故改用今名，以免相混”。见《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424页。

⑤ 金飞：《盐井县考》，载《边政》1931年第8期。

1910年边军所规定的《盐井初办捆商时变通规则及议定盐价》六条的内容。文章着重分析了盐业的基本概况,卤水井、盐池、盐田、运销、缉私均在列,基本反映了清末民初这一时间段内盐业的基本情况。除此之外,当属《清末川滇边务档案资料》^①中收集了改土归流中涉及盐井地方事务的一些奏折和电文,主要记录了有关赵尔丰川边改土归流时期收复盐井、进行盐业改革、税收等方面的内容。此后有《盐井县纪要》^②一文于1931年发表在《边政》上,作者和写作的时间均不详,作者试图套用志书,罗列了沿革、山川、交通、学制、税制、币制、礼俗、户口等项目,但仅在税制中谈及民国初期时盐井的盐税情况。除此之外,民国期间的《西康公报》《西康经济季刊》《新西康月刊(南京)》《新亚细亚》《论盐丛报》等^③刊物发表了有关盐井的盐业、盐税和地方管理的文章。这些文章,多被研究盐井的学者们所遗漏。

(二) 有关盐井的专门性论述

民国三十年(1941年),尽管时局动荡,但崔克信仍然冒着生命危险,跟随着从巴塘来盐井驮盐的马帮来到盐井,乔装成商人在盐井进行了为期17天(实际只有15天左右)的调查,著有《盐井县之地质与盐产调查》^④一文,从地质学的角度论述了盐井盐成盐的因素及各种矿物质含量的比例。此外,就盐的有关生产技术、组织、产销、交通以及盐井盐技术层面上存在的不足进行了论述,并提供了相关建议。这对于从技术的角度探讨盐井盐业生产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可惜的是,由于专业角度的局限,崔氏并没有关注物质生产背后的生产关系。此外,受时局影响,未能做详细的调查,因此他的研究从客观层面上讲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指出的是,该文献长期以来为后人所忽视,包括那些从事盐井专门性论述的学者,如冉光荣、朱霞、李晓岑、陶宏、黄健、吴成立、江洋等人。此后,人们开始关注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例如,2010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四川省考古研究院三家单位联合对盐井进行了考古学调查,发表了《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芒康县盐井盐田调查报告》^⑤一文。该文主要对盐业生产的生产工具和制盐设施

①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编写组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中、下三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佚名:《盐井县纪要》,载《边政》1931年第6期。

③ 《夷务:西康盐井县知事呈军部收复河西加达欧曲村夷众就抚情形由》,载《边政公报》1929年第2期;《西康消息:各县通讯——盐井县县署办理二十年度户口统计县已竣事》,载《西康公报》1932年第42期;《纪事二:各县区纪事:西康:盐井县盐务之整理》,载《谈盐丛报》1931年第27期。

④ 崔克信:《盐井县之地质及盐产调查》,载《西康经济季刊》1944年第8期。

⑤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四川省考古研究院:《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芒康县盐井盐田调查报告》,载《南方文物》2010年第1期。

进行了测量，但未就相关问题展开分析。

冉光荣的《清末民初四川盐井县井盐生产述略》^①一文，主要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解读试图论述盐井（此处的“盐井”就是现在的西藏芒康县盐井乡）的盐业生产，对于文献史料相对缺乏的盐井而言，要进行盐业相关问题的研究，实属不易。作者进行了四个方面的论述：①盐井县及盐井、盐厢（盐田）概况；②官盐局时期；③盐商局时期；④井盐业的积极作用。在前人文献记载的基础上，作者指出盐井盐对整个康区的开发具有积极而特殊的功能，是其他地区的井盐，乃至海盐、池（湖）盐难以企及的。作者得出的结论是，盐井盐的存在增加边务经费，并带动了赋税制度的推行；盐井盐支持了四川铸银元、铜元在西藏的流通，抵制了印度卢比的使用范围，维护了中国在金融领域中的主权地位；盐井盐的量衡制度有助于标准度量衡器的推广；盐井盐的流通增进了察隅地区珞巴人、僜人和藏、汉等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团结。但是，冉氏的研究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①整个论述所使用的材料多来自盐井的地方志，未亲自到盐井进行实地调查，其结果是，他在有些问题的看法上带有片面性。②冉先生着重论述的是赵尔丰改土归流前后的盐业情况，未对寺院和土司制度下的盐业情况以及民国期间的盐业相关情况进行论述，最终导致看待盐井盐业的视角仅停留在改土归流，但是从历史节点来看，赵尔丰掌握盐井权力的时间未超过5年，要客观了解盐井盐业，显然需要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盐业状况。

21世纪初期，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纷纷踏入西藏东部这片原本神秘的土地，试图揭开该区域各民族文化的面纱。随着学术界越来越关注西南地区有关盐业相关问题的研究，围绕盐的生产技术、盐的运销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出现了2篇硕士学位论文和2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博士学位论文^②均以云南西部云龙县境内的诺邓盐场为研究对象，前者论述盐业生产同民俗的关系；后者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关注诺邓盐场在特定历史场景中的文化图像，以及围绕盐，诺邓如何同地方、国家发生关系。其中2篇硕士学位论文均研究西藏盐井的生产技术和地方文化。吴成立的《西藏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盐文化研究》^③作为一篇学位论文，从文化的视角围绕盐业论述了技术、销售、税收以及习俗等方面的内容，还就井盐与海盐、池盐、湖盐进行比较。该研究

① 冉光荣：《清末民初四川盐井县井盐生产述略》，见彭泽益、王仁远主编《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354～370页。

② 舒瑜著：《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朱霞著：《云南诺邓井盐生产民俗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③ 吴成立：《西藏芒康县纳西民族乡盐文化研究》，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收集到一定的历史文献,试图对盐井的盐文化进行建构。总体看来,文章内容丰满、面面俱到,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除忽视了一些重要文献之外,论述并不深入,有隔靴搔痒之嫌。而江洋的硕士学位论文《西藏盐井纳西族盐业生计方式的传统与变迁》^①,仅从内容来看,就比前者逊色得多,篇幅仅有前者的三分之一;作者选择的调查点单一,未能覆盖整个盐井的制盐村落,何况3个制盐村还存在一定的文化和制盐细节上的差异。

诸如此类分析西藏盐井盐文化的文章,包括以游记形式出现的报道,数量不少,虽让我们看到盐井文化的特殊性,但明显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学理分析,很难上升到“整体观”视角的理论研究,更谈不上和中外盐业文化进行对话。整体上,西藏盐井盐业相关问题研究凤毛麟角:第一,没有专著的出现,缺乏系统性研究;第二,学界发表的有关西藏盐业的论文,除冉光荣的《清末民初四川盐井县盐井盐生产述略》^②一文之外,目前对盐井盐业的研究多停留在表面的描述,未能抓住事物本质,且多出自旅游者或文学艺术爱好者之手,未能分析盐背后的人物关系,更谈不上有系统研究,有种“身在庐山,却不见庐山真面目”之感觉。^③

四、简要述评

总体看来,中国盐业相关问题研究成果丰富,据学者统计:出版著作150余部、发表1500余篇论文,硕士学位论文40篇,博士学位论文12篇。^④这些成果从研究的学科来看,主要集中在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经各学科的努力,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效;主要涉及了有关盐的盐政、盐法、盐商、盐税、食盐生产技术和运销(专卖)等宏观问题。整体看来,主要围绕食盐产量丰富的地区,多进行历史文献梳理;观点有冲突,但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都承认盐作为人类的生存必需品,对国家政权的实施和稳定有重要意义,且盐业长期以来受国家强制力操控。不过,中国盐业研究依然还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研究学科来看,缺乏民族志作品出版。尽管研究中国盐业史的论文、论著、史料,可谓不胜枚举,但是不得不承认,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历史学、政

^① 江洋:《西藏盐井纳西族盐业生计方式的传统与变迁》,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② 盐井当时归四川巴塘所辖,现在属于西藏芒康县所辖的纳西民族乡。

^③ 这个时期的调查成果主要有陶宏:《茶马古道上的盐务重镇——盐井乡》,载《中国文化遗产》2005年第5期;朱霞、李晓岑:《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盐井镇的井盐生产》,载《中国藏学》2007年第3期;陶宏、黄健:《西藏芒康县盐井乡盐业研究》,载《盐业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④ 参见吴海波、曾凡英著《中国盐业史学术研究一百年》,巴蜀书社2010年版。

治学、经济学等传统学科。对此，学者指出，除了传统的文、史、哲、经等学科领域外，应适当将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吸引和整合到盐业史的研究中来，盐业史研究同其他学科合作的空间很大，研究方法上也可以相互渗透。^①的确，就目前与盐业相关的研究成果来看，即便有的论著已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对盐业史进行了分析，不过仍然缺乏其他学科的视角和方法融合进来。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缺乏从综观的角度分析影响盐业发展因素的论著。将人口（生产盐的人口和消费盐的人口）、技术、制度（盐业管理和税收）等因素作为考察盐业发展角度的论著还未出现，缺乏历史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研究。传统的盐业史研究方法上采用自上而下的路径，然而这种多在旧史学中采用的方法，早受到历史学界的摒弃。赵世瑜认为，自上而下的旧史学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精英政治史，这种研究可能带来的结果是研究者缺乏主体的自觉，自我优越感强，却很少站在同情和理解的立场上看待问题。^②也就是说，这种眼光向下的研究方法，给人的感觉是“只见森林，却见不到树木”。因此，适当从自下而上的视角进行剖析，对盐业史研究而言是要寻找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途径。

从研究的区域来看，缺乏对边缘地带以传统盐业技术为载体的区域文化的研究，如西藏“政教制度”下有关盐和税的研究几乎空白。总体上，盐业史研究选题在时间和空间的选择上存在不平衡。^③从空间上来看，诸多学科对盐业史的研究均集中在各大盐场。对明清以来的盐业研究，主要集中在长芦盐区、河东盐区、山东盐区、两淮盐区、两广盐区、四川盐区和云南盐区几大盐区，往往忽视了几大盐场外围的小盐场，如海南的洋浦盐田、西藏芒康的盐井盐田等盐产地。对历史资料丰富、影响力大、盐业体制较为系统的盐区进行深度研究，这无可厚非，不过边缘地带的盐业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从研究的对话点来看，目前缺乏不同盐文化之间的对比研究，如井盐和海盐之间、煎盐法和晒盐法之间、南部晒盐法和西部晒盐法之间。此外，缺乏中西不同盐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忽视了中国传统盐文化同周边国家不同盐文化之间的关联和影响。

① 参见吴海波、曾凡英著《中国盐业史学术研究一百年》，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212页。

② 参见赵世瑜著《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页。

③ 参见吴海波、曾凡英著《中国盐业史学术研究一百年》，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208页。

第三节 理论借鉴的来源

一、有关物的研究

文化人类学本着整体论的方法来研究“物”，重点是“透物见人”。例如，马林诺夫斯基通过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库拉交易圈，揭示了在物质流动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与亲属关系；莫斯在《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借物的转手说明情感（功利心、道德心、爱心、美感等）的传递。继莫斯之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认为物是外在的结构，通过交换触发了其与社会心理结构的联系。

20世纪80年代，阿尔君·阿帕渡莱编著了《物的社会生命——文化视野中的商品》一书，艾戈·科皮托夫在其中发表了《物的文化传记：商品化过程》一文，对物的研究可谓更上一层楼。阿帕渡莱把物看作有生命史过程的东西，指出物如人一样会经历不同的生命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中，物所表现的价值和意义不同^①。这打破了传统的“死物论”，关注物在交换之后发生的事情^②。物并非长期停留在单纯的“礼物”阶段，迟早会有“去商品化”的时候。科皮托夫提出了两个概念：“商品化”和“去商品化”，即说明了物并非永久性地停留于某一个阶段，在不同的情境下物自身表达的意义是不同的。1996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C. 尤林在解读法国葡萄酒时，将其当作流动的商品，分别与中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和当代的三种世界体系相对应，描绘了这一特定饮食文化的动景图。^③

上述研究说明研究物的人类学家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关注商品的社会属性，因为他们知道《资本论》对商品拜物教所做的深刻论述^④。近年来，有人提出

① Arjun Appadurai.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In: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

② Igor Kopytoff.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64 ~ 84.

③ 参见〔美〕罗伯特·C. 尤林著《陈年老窖：法国西南葡萄酒业合作社的民族志》，何国强译，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④ 详见《资本论》第1卷，第一章，“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物与物质文化研究最大的贡献，也许不是在物自身性质的探讨上，而是对文化本身的探讨”^①的观点，并且从生产、流通、消费阶段中寻求物自身的意义和探讨价格生成的过程。可以看出，这种观点直接受到阿帕渡莱等人的影响，间接受到马克思的影响。

二、区域视野下有关西南地区物的流动研究

就物的研究而言，西南地区物的流动性问题已经受到学者的关注，族群间的生活必需品的流动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如“茶马互市”“丝绸之路”等带来的物的流动。20世纪90年代初，木霁弘等人针对滇藏之间的茶叶贸易，对云南境内重要的马帮驿站进行了考察，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民族之间的商货流通、马帮通行的交易通道的学术概念。^②但是有的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在《隐存的白金时代——洱海区域盐井文化研究》一书中，作者指出“盐马古道”远比学界普遍关注的“茶马古道”出现得更早，可以说“茶马古道”前身是“盐马古道”。^③显然，拿盐和茶叶做比较的话，人体对盐的需求要比茶更加强烈，因此，“短距离的盐的贸易比茶的贸易更早”这一论断更合情理。任乃强认为，古羌系部落南下可能是在寻找盐泉，而停留在昌都察零多一带的古老民族是眷恋上了这里的盐泉^④。

在西南的区域文化研究中，学者较为关注藏族和纳西族的两族关系，并分别就族源、文化、政治等方面对两族进行了研究。2004—2005年，《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⑤和《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⑥先后出版，这两本书谈到自唐代以来藏族和纳西族的文化交往，藏族一般出产羊毛、牛皮、酥油等，这些特产往往被藏民用来换取粮食、茶、布匹等生活必需品。明末清初时这种贸易交换达到高峰。

张应强通过木材的放排展示了贵州苗区历史际遇中的权力关系^⑦。这种研究方法得益于弗里德曼的综合论（综合理解血缘、地缘、市场、精英、区位、

① 黄应贵：《物与物质文化》，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3年版，第2页。

② 参见木霁弘著《茶马古道上的民族文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参见赵敏著《隐存的白金时代——洱海区域盐井文化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④ 参见任乃强著《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5页。

⑤ 赵心愚著：《纳西族与藏族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⑥ 杨福泉著：《纳西族与藏族历史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

⑦ 参见张应强著《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和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国家的互动的理论)^①、施坚雅的市场结构^②和雷德菲尔德的乡民社会观点(一种从“小地方”看“大历史”的方法),将社会整体结构的分析建立在市场和制度的互动关系中。这对本书理解盐井的盐市同权力运作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黄国信对于清代广东海盐向湘、粤、赣销售的研究突破了地方观念和国家制度的限制,指出清政府采取了食盐专卖的区域划分的措施,但是,划界后的食盐专卖边界却是不断变化的、模糊的。此观点打破了划界行盐的传统观念——盐的运销其实并非严格操守界限,以此引出食盐销售中的“界”和“区域”这两个重要概念,用来探讨食盐专卖制度的变迁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③

三、考古学视野下的盐业研究

考古学对盐业的研究,也是物的研究的一种范式,不过在这里将盐业考古重点提出来,显然是因为盐业考古对传统研究盐业方式起到了弥补不足的作用。本书所研究的西藏盐井传统晒盐技术在明代以前的历史资料相对缺乏,这对于试图通过历时性的方法建构一个地方的社会变迁以及通过盐业的生产、交换和运销来反应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博弈显然有一定困难之处。考古学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弥补早期历史文献的不足,这对本书的研究是一个莫大的启发。正如罗瓦安·K. 弗雷德所言:“考古学研究的长处在于它能够通过将研究的焦点聚在时间上的变迁,以此思考具有广泛的人类学意义的问题。”^④而且考古学自20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始终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复杂社会于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产生。围绕着新石器晚期及青铜时代黄河谷地中央集权制酋邦国和帝国扩张的形成过程,不少西方学者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⑤不过,通过研究,人们慢慢发现盐业在整个人类文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盐业考古》是基于21世纪初以来考古学对中国四川盆地的大中型盐业遗址的关注,以及通过不同国家的盐业考古发现而形成国际视野下的跨文

① 参见[英]莫里斯·弗里德曼著《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参见[美]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参见黄国信著《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④ Rowan K. Flad. *Salt Production and Social Hierarchy in Ancient China: A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Specialization in China's Three Gor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0.

⑤ Rowan K. Flad. *Salt Production and Social Hierarchy in Ancient China: An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Specialization in China's Three Gor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